

(京)新登字056號

# 中國石窟寺研究

宿白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美通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1996年8月第一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740-3/K·315 定價：210元

宿白

# 中國石窟研究

九月

三日

同上



國 家 “ 六 五 ” 社 會 科 學 規 劃 重 點 項 目





宿白

宿白，中國現代考古學家。遼寧省瀋陽人。1922年8月3日生。1944年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1948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業，并任職于該所考古學研究室。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兼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79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同年被選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1983年任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兼該校學術委員。同年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

1951年宿白主持河南禹縣白沙水庫墓群的發掘。1958年主持河北邯鄲洞溝—齊村龍山—商周遺址的發掘。又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學石窟寺遺迹的考古實習，對響堂山石窟、敦煌石窟、龍門石窟和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都作過測繪或部份測繪、記錄和研究。1959年參加對西藏文物的調查。其主要學術成就是，運用類型學方法，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作過全面的分區分期研究，從而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制度的演變、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奠定了基礎；他結合文獻記載，對這個時期城市遺址作了系統的研究。對當時都城格局的發展、演變，提出了創見。對宋元考古作過若干專題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書，體現了在研究方法上將文獻考據與考古實物相結合，是宋元考古學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迹。近年來曾先後訪問過日本、法國和伊朗等國，進行考古方面的學術交流。1983年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佛教考古學。

宿白的主要學術論著還有：《北魏洛陽城與北邙陵墓》、《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和內容》、《隋唐城址類型初探》、《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南宋的雕版印刷》、《居庸關過街塔考稿》、《雲岡石窟分期試論》、《敦煌早期洞窟雜考》、《〈大金武州山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新疆拜城克孜爾部份洞窟的類型與分期》和《趙城金藏與弘法藏》等。

# 中國石窟寺研究

宿白

文物出版社

# 目 錄

前言	( 11 )
中國石窟寺考古	( 16 )
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部份洞窟的類型與年代	( 21 )
涼州石窟遺迹與“涼州模式”	( 39 )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註	( 52 )
雲岡石窟分期試論	( 76 )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	( 89 )
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	( 114 )
恆安鎮與恆安石窟	( 145 )
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	( 153 )
南朝龕像遺迹初探	( 176 )
《莫高窟記》跋	( 200 )
參觀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札記	( 206 )
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	( 214 )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	( 226 )
東陽王與建平公（二稿）	( 244 )
建平公于義續考	( 260 )
《武周聖曆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合校	( 262 )
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問題	( 270 )
敦煌莫高窟密教遺迹札記	( 279 )
記西藏拉薩札拉魯浦石窟寺	( 311 )
元代杭州的藏傳密教及其有關遺迹	( 313 )

附錄一	北魏石窟與禪	劉慧達	( 331 )
附錄二	北朝造型藝術中人物形象的變化		( 349 )
附錄三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三種拓本與兩種錄文合抄		( 355 )
圖版			( 357 )
圖版說明			( 403 )
圖版目錄			( 412 )
插圖目錄			( 415 )
索引			( 421 )
後記			( 481 )
CONTENTS			( 474 )
SUMMARY			( 476 )



# 前 言

《中國石窟寺研究》共搜集文章二十三篇。

第一篇《中國石窟寺考古》原是《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的一個條目，現經增補，作為本書一篇概論中國石窟寺的文章，編于卷首。後面的文章大體可分六組：

第一組兩篇。探討我國現存兩處最早的石窟遺迹，即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和以甘肅武威天梯山石窟為中心的涼州石窟。前者着重部份洞窟類型和年代的探討，後者着重特徵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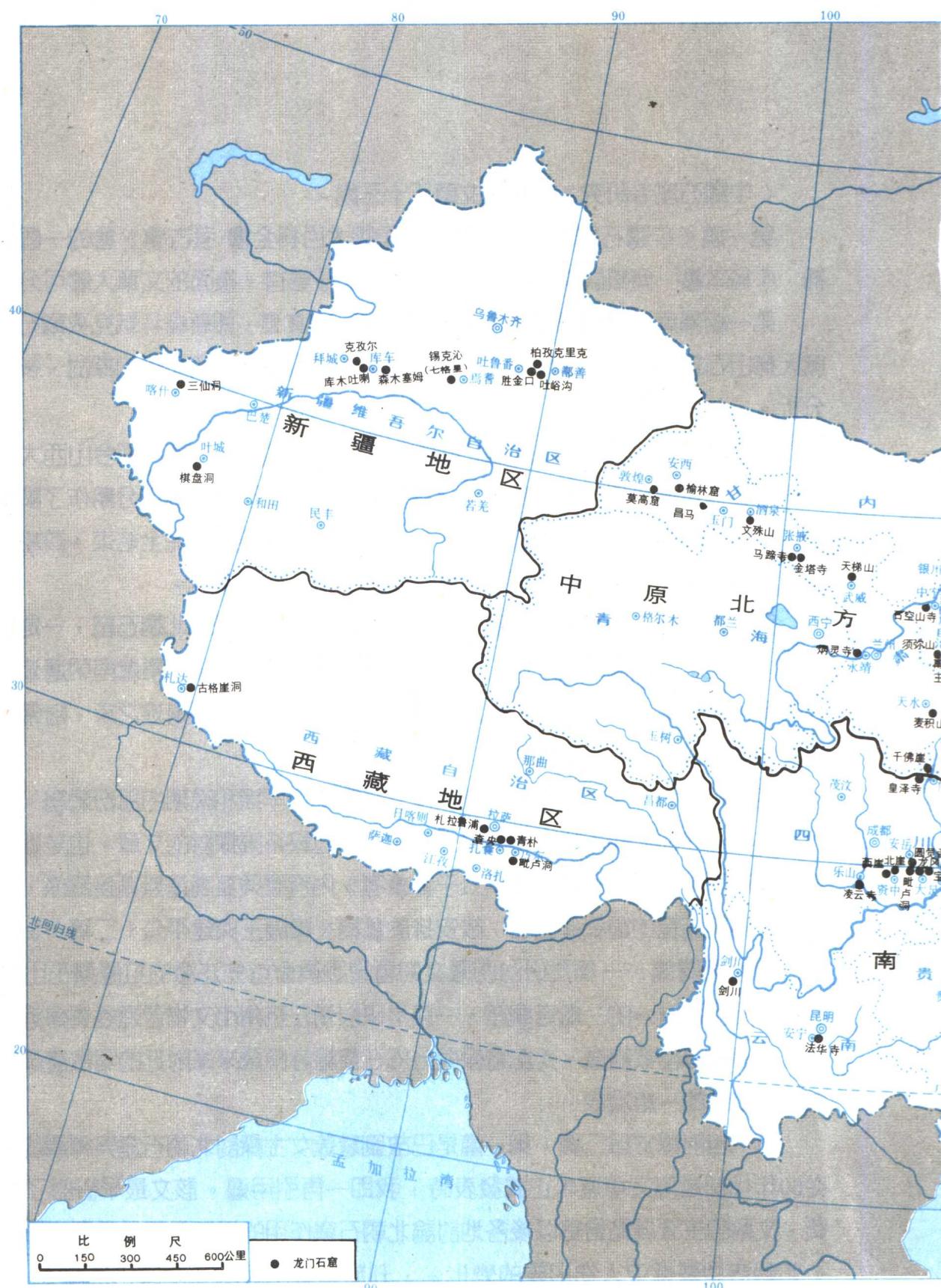
第二組五篇。都是關於5世紀後期開始開鑿的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的討論文章。根據40年代發現的文字資料，我們對雲岡石窟的排年分期作了調整，引出了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的一番討論。這個討論，現在似乎還沒有完全結束。該組最後的兩篇文章，試圖較全面的研討雲岡石窟的歷史問題，是近期撰寫的。

第三組兩篇。一是研討沿襲雲岡石窟的河南洛陽地區的北朝石窟，一是研討兩處南朝龕像，即江蘇南京棲霞山千佛岩和浙江新昌剡溪寶相寺龕像。兩處南朝遺迹，都比雲岡開鑿的年代為晚，大抵與洛陽龍門北魏窟龕同時。在研討南朝遺迹之末，附帶論述了與南朝龕像頗為類似的兩處北齊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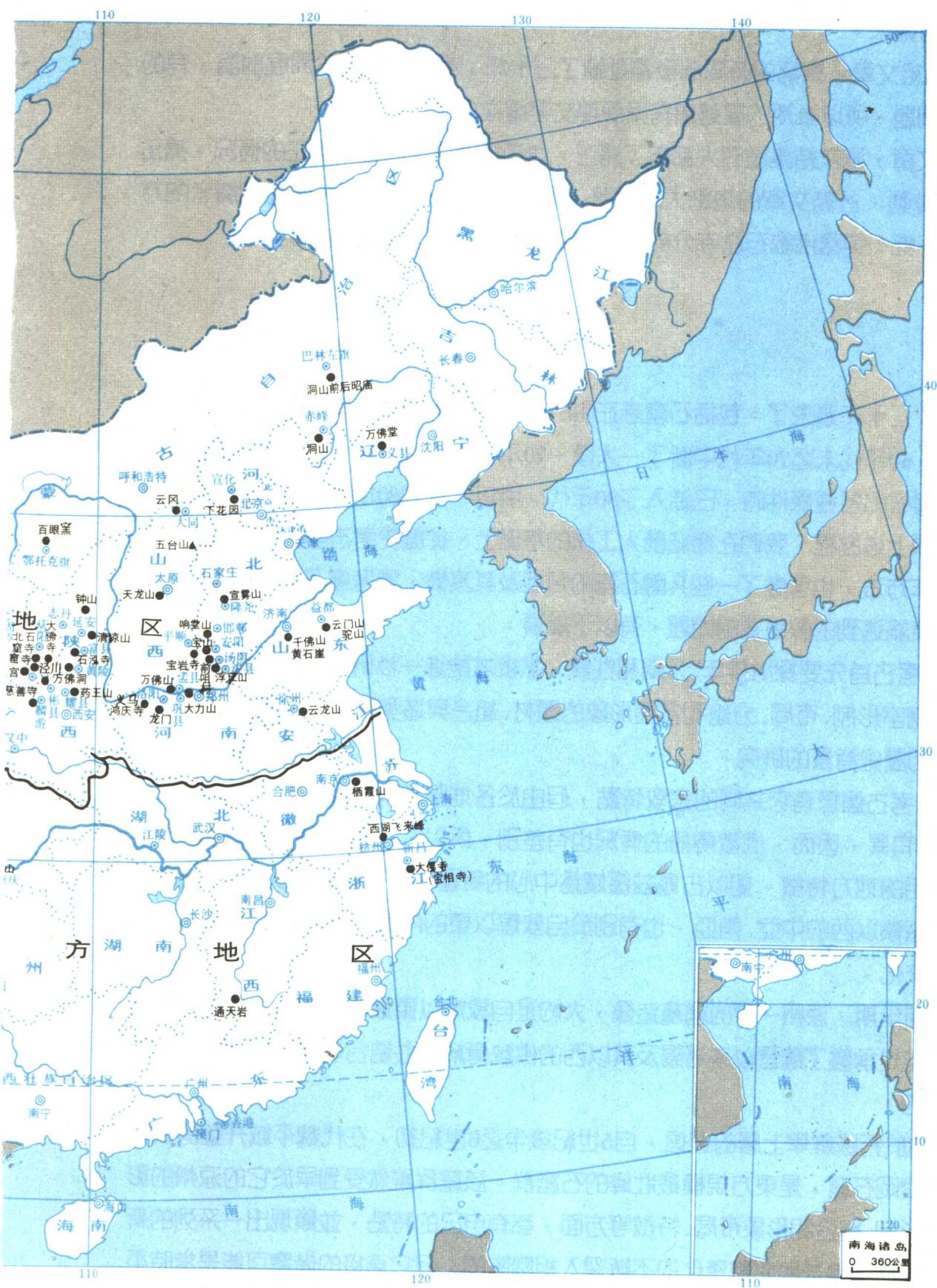
第四組九篇。主要是研討甘肅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和晚期的部份洞窟。文章的大部份論點，雖然在50迄60年代之初即已大體形成，但較系統探討的文章，也是近期寫出的，即本組的最後兩篇。新寫的《建平公于義續考》內容雖與莫高窟無直接關係，但于義本人是北周時期莫高窟的重要建窟者，故安排於舊稿《東陽王與建平公（二稿）》之後。

第五組兩篇。一篇是研討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首先注意的拉薩藥王山札拉魯浦石窟寺，它是西藏唯一的一處塔廟窟。一篇是研討浙江杭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近年清理出的吳山寶成寺藏傳密教龕像，此處龕像與分佈在靈隱寺前飛來峯附近的零散龕像不同，而是原處於佛殿內的一組龕像。

第六組附錄文章二篇。第一篇是已故劉慧達女士探討北朝石窟與禪觀的關係的論著。從60年代初這篇文章還未正式發表時，我即一再引用過。該文最早研討了北朝石窟的性質，文章的主要論點曾給以後各地討論北朝石窟作用的研究者較為重要的影響。第二篇是《北朝造型藝術中人物形象的變化》，刊於臺灣出版的《中國古佛雕》一書中。原是寫《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時考慮到的一條注釋，後因文字較多，抽出另刊。現以該文涉及整個北朝石窟，故附錄於此。附錄三是據拓本和錄文復原《李君莫高窟佛龕



# 中國佛教石



窟寺分佈圖

碑》的兩張圖紙（碑陽、碑陰各一張）。兩圖原為《合校》製作，但對進一步研討碑文亦有裨益，因錄附篇末。

第二、四兩組文章，撰寫的時間前後都延續了三十年，有的因為便於開展討論，有的為了突出某些問題，所以後期的論述頗有與前期文字重複處。

以上六組文章，這次結集重刊大都作了補正，並在每篇之末簡述了補正的情況。補正主要是資料的變動，各篇文章的論點大體照舊。此外，本集在編排中，考慮到讀者的方便，還增補了一幅《中國佛教石窟寺分佈圖》，排在前言的中心頁上，供參考。

\* \* \*

光陰荏苒，三十年過去了。包括石窟寺在內的中國佛教考古的整理研究工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50年代末迄70年代中斷了一大段。70年代末開始恢復。有了可以對石窟遺迹進行較全面考察的各種條件時，已進入了80年代。所以，直到80年代才能真正作些較踏實的工作。回顧上述歷程，我們在總結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從歷史考古學角度，考慮了石窟寺的基本工作方法，也考慮了一些具體石窟的類型及其演變，還考慮了晚期石窟與寺院的聯繫。本論集論述到的較重要的問題，有以下幾項：

一、石窟寺考古首先要探討排年、分期和性質，然後才能進一步研討它的社會意義。因此，既要注意窟室形制、布局、分組和各種形象的題材、組合與造型特徵，又要注意各種有關的文獻記載和歷史背景的研究。

二、石窟寺考古儘管有它共同的宗教特點，但由於各地區經濟狀況不同，人們的文化傳統、生活習俗有異，因而，佛教傳播的情況也有差別，所以，石窟寺也和其他考古資料同樣呈現出鮮明的地方特徵。如以古龜茲區域為中心的新疆中部石窟寺為例，它的發生、發展既不同於葱嶺以西的中亞、南亞，也有別於自敦煌以東的內地，它形象地反映了高度發展的古龜茲文化。

三、5世紀前半期，涼州一帶的窟龕造像，大約是自敦煌以東最早形成的重要佛教遺跡地點。它可能是承襲了魏晉以來洛陽及其以西的佛教傳統，並結合新疆中部南北兩地區的影響而出現的。

四、主要由於拓跋鮮卑上層的提倡，自5世紀後半迄6世紀初，在代魏平城開鑿的武州山石窟，即今雲岡石窟，是東方規模最壯偉的石窟群。該窟群雖然受到早於它的涼州的影響，但在窟室形制、組合和形象布局、特徵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並顯現出一系列的新發展趨勢。這種趨勢是與北魏漢化的不斷深入相關聯的，但它直接的借鑒可能是當時平城興建的寺院，而平城寺院可以估計越來越多中原和南方的因素。公元494年以前，平城一直是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武州山石窟的創新，很快成了當時北魏境內各地興

鑿窟龕仿效的典型。

五、北魏遷洛後二十多年間，平城技藝不斷南徙，因此，洛陽附近出現的石窟大都可視作武州山工程的繼續。6世紀20年代以來，洛陽地區石窟呈現的一些新因素，它的淵源大抵和武州山前此出現的新趨勢情況相似，即可能源於洛都佛寺。而這時的洛都寺院，特別是形象的造型、裝飾，應該更多受到江南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洛陽地區的塔廟窟與佛殿窟出現了分地開鑿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此後的東魏、北齊得到了承襲：接近鄴都的鼓山石窟（包括南、北響堂山石窟和水洛寺石窟）皆是塔廟窟，而晉陽西山的崖壁俱鑿佛殿窟。西魏、北周似乎也有這種情況：秦州麥積崖都是佛殿窟，而原州須彌山卻多塔廟窟。

六、敦煌莫高窟雖然鄰近新疆，但就現存早期窟室言，更接近於內地雲岡石窟和洛陽地區的北朝石窟。如果再進行具體比較，莫高窟現存最早窟室似乎還不早於雲岡第二期早期，而接近於第二期中期階段，這大約和5世紀80年代以來迄6世紀初期，北魏逐漸鞏固了對敦煌的控制的歷史背景有密切關係。

七、敦煌的地理環境屬綠洲類型，各種資源並不豐富，但卻當東西交通要衝，那裡保存的古代遺迹，特別是輝煌的藝術巨制，主要應轉手自當時東方的某些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事過境遷，曾是東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古代遺迹早已湮滅或大部無存，而當時或接近當時較完整的臨摹副本尚在人間，此敦煌遺迹之所以至為重要，莫高窟所存大量的並有系統的密教遺迹，應是說明這類問題的一個佳例。

八、兩處南朝龕像表現了它與中原更早一個階段的聯繫，也反映了它對北朝晚期龕像的影響。

九、西藏窟龕形制和性質的研討，是近年中國石窟考古工作中新开拓的項目，它的詳細情況還有待進一步調查。13世紀末葉以來，隨着藏傳密教的東傳，藏式龕像也出現於內地，杭州飛來峯和吳山的遺迹，應是瞭解薩迦教派所奉尊像的重要實例。

十、15世紀以前的藏傳密迹，西藏地區保存甚少，現知保存較多且具系統的地點是莫高、榆林兩窟。兩窟藏傳密迹又直接與所存唐密遺迹相銜接，因而又是探索唐密、藏密關係的極為難得的形象資料。

以上列舉的還只是一些初步看法，現在把這些看法匯集起來，目的是便於國內外同好的審閱，期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評指正。

《中國石窟寺研究》是列入國家“六五”社會科學規劃的重點項目之一。本書內所收1980年以降撰寫的文章其調查研究的經費和全書最後的修改、清抄費用都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

一九八九年十月

# 中國石窟寺考古

在河畔山崖開鑿的佛教寺廟，簡稱石窟。許多石窟寺洞窟密集，故常有千佛洞之稱。佛教石窟淵源於印度，中國開鑿石窟約始於3世紀，盛於5~8世紀，最晚的可到16世紀。

分佈於中國各地的石窟寺遺迹，大都見錄於明清地方志和游記中。20世紀初一些外國人即根據上述著錄調查了一部份重要石窟，如日本人伊東忠太調查山西大同雲岡石窟（1902），法國人E.沙畹調查河南洛陽龍門石窟（1907）。不少外國人的調查，往往伴隨着掠奪和破壞，德國人A.von勒科克在新疆拜城、庫車、吐魯番諸石窟盜掘遺物、剝離壁畫（1904、1913）；英國人A.斯坦因（1907、1914）、法國人伯希和（1908）和日本大谷考察隊（1911~1914）等對甘肅敦煌莫高窟發現的重要經卷、文書和工藝品的騙取劫奪；日本人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1933）和美國人對龍門石窟（1934）的肢解石雕、鑿毀造像等，以上是其中最突出的幾起。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組織的雲岡調查班，對雲岡石窟強行調查、攝影、測繪長達6年之久（1941~1946）。中國有組織的調查工作始於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學考察團調查新疆石窟，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國營造學社都對響堂山石窟作了記錄。40年代不少學者和學術機構注意到甘肅、四川、雲南和新疆境內的石窟，特別是對敦煌石窟的調查、實測和臨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石窟遺迹得到應有的重視，各地對現存石窟都開展了調查和記錄工作，並發現了許多湮沒已久的重要窟龕。50年代以來，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漸展開：對一些石窟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進行排年分期；發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遺址，為恢復某些石窟的歷史面貌增加了新資料；對石窟組合關係的探索也開始提到日程上來。

中國的石窟可分七類：一、窟內立中心塔柱的塔廟窟；二、無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三、主要為僧人生活起居和禪行的僧房窟；四、塔廟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五、佛殿窟內設壇置像的佛壇窟；六、僧房窟中專為禪行的小型禪窟（羅漢窟）；七、小型禪窟成組的禪窟群。根據洞